



“大众政治学丛书”

丛书主编 乔耀章

全球化

与

中国国家利益

朱炳元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全球性

中國利益



“大众政治学丛书”

丛书主编 乔耀章

· 全球化与 ·

中国
国家利益

朱炳元
主编

·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 王亚男

装帧设计 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 朱炳元 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6

(大众政治学丛书 / 乔耀章 主编)

ISBN 7-01-004168-7

I. 全... II. 朱... III. ①国际化—研究 ②国家利益—研究—中国

IV. ① D81 ②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999 号

书 名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QUANQIUHUA YU ZHONGGUO GUOJIA LIYI

朱炳元 主编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北京京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01-004168-7

定 价 19.00 元

“大众政治学丛书” 卷首语

为迎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春天，为政治学学科园地的百家争鸣，为“知识政治”或政治知识的普及与大众化，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

本丛书紧紧围绕着当代、政治、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实践等几个关键的基本问题与范畴展开分析和研究，阐述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丛书的侧重点或中心内容。其中，政治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因为“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罗伯特·达尔语）政治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万象有种种界说，我们倾向于将政治理解为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威及公共权力对全局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决策和分配的活动。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异而变异。而政治学则是关于政治的知识、学识、学问和可传承性的知识体系。确切些说，政治学是关于研究人类社会作为政治生活活动层面的政治或政治实践和作为观念理念层面的政治或政治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学识、学问和可传承性的知识体系。政治及其政治学的普遍性、可传承性特质是由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可传承性决定的。因此有关政治、政治学的知识应该普及，应该使之大众化。从这个特定意义上可以将本丛书定名为“大众政治学丛书”。

从时间或历时态的维度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活动层面的政治或政治实践可分为历史的政治实践、现实的政治实践和未来的政治实践，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观念理念层面的政治或政治理论也可分为历史的政治理论、现实的政治理论和未来的政治理论。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形态，它们是一种历史传承性的互动关系。从空间或共时态的维度看，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政治理论，都可分为东方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西方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不同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由此产生“差异性政治实践”和“差异性政治理论”，形成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差序格局”。从时空维度和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相互关系上看，存在着两种“先行”现象：一方面，政治实践产生、决定、制约着政治理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实践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先行于政治理论；另一方面，政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这种能动的反作用大体表现为它与政治实践的同步性、滞后性和前瞻性（政治理论先行于政治实践）三种情形。在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各自有着历史传承性互动的基础上，产生历史的政治实践与历史的政治理论、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现实的政治理论、未来的政治实践与未来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不仅如此，历史的政治实践与现实的政治理论、历史的政治理论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现实的政治实践与未来的政治理论、现实的政治理论与未来的政治实践之间也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可见，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没有“闭锁”着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它们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尤其如

此。所谓当代政治学理论与实践,旨在十分珍惜历史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的(尤其是当今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正视分析和解决现实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为的是奋力开拓未来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因此,本丛书从时空维度的结合上入手,着眼于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现在进行时态的分析和研究,努力揭示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中那些能够与时俱进的异质性和共质性的特质,为推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服务。

基于上述对政治的理解,我们认为政治学是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一般知识,它涉及到政治的历史知识、政治的理论知识、政治的方法知识、政治行为主体的知识、政治意识的知识、政治机构的知识、政治运行的知识、政治发展的知识,等等。但是,历史上政治学曾一直滞后于并与先于它的法学、哲学、伦理学、文学等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东西方两种既分又合的演进趋势。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事。这里有两个关系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研究的: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关系问题,一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关于前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今天,人们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同样,人们也似乎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把政治学看作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的分支学科，因此，“学科”不等同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之整体远远大于隶属于它的各分支学科之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都不能简单地无条件地冠以“科学”之名，即便是曾被人们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也不能冠以“哲学科学”之名，只有哲学社会科学之整体才能冠以科学之名。关于后者，既然如此，能否使用“政治科学”这一概念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不过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国内外不少学者经常使用“政治科学”这一概念，并且经常把政治科学同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学说、政治思想，甚至同政治哲学等概念相提并论，等同视之。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或任何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都可以同“政治科学”划等号的，由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具体的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性，只有那些产生于既定的政治实践，又能够指导既定的政治实践，并能够经得起既定的政治实践的检验，通过既定的政治实践的检验和发展而揭示出政治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才可能是属于政治科学的。换言之，有别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它着重于借助科学的概念与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研究广泛的政治现象，探究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独特的概念体系，从中形成解释性的或预测性的理论假设。这种理论假设既源于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即各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等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科学真理的要素，它们各以其政治的异质性对人类社会政治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程度不同的贡献，这种不同只是政治智慧和政治发展、政治成长的程度的不同，而不会因此影响它

们之间的政治平等和学术平等,它们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否认异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的存在,而且谁都不能独自宣布发现和拥有、甚至垄断政治科学;但同时又高于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并以其政治的共质性或科学性超越具体的民族国家范围,从而使政治科学而不是某种政治学说、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引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潮流,提高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质量的一种普照之光,它既不能被人造的割裂,也不能被人造的拒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是可以有国界的,而政治科学或政治学的公理则是无国界的。我们应当慎用“政治科学”这个概念。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多重转型”时期,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现实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呈现出多重复杂性、多质并存性来,表现为一种“混合型”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所谓混合型主要有四个层面构成,即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具有“后发性”(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先发性而言)、“融合性”(尤指对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以海纳百川的“善下”姿态进行优势互补)及其发展的“定向性”(以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旨归)等特点或特征。本丛书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理论与实践重在建设这个时代主题。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我们研究的能力所及,丛书主要限于:发展政治学、全球化与国家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

中介组织、政治建设、政府建设、政府外交、区域政府与政治、人权问题等领域和方面。我们将以不懈的努力保证该丛书能以较高学术质量完成，来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在此，我谨以卷首语作为本丛书的总序。

乔耀章

2004年4月于苏州大学

前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般地说，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是经济全球化。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密化，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日益扩大和深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不管人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都会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向前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交通、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为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加速推进提供了物质前提。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所未有的扩张，全球化的规模日益扩大，速度空前加快。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普通老百姓，都已强烈地感受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气息。

全球化虽然已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其内在动因，应该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寻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寻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追溯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全球化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变成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为了达到经济上的目的，他们到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把哲学、文学等日益变成世界性的人文“科学”。这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从各种可以归结为全球化的现象来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与破坏并存、融合与冲突并存、交往与较量并存的矛盾过程。全球化的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全球反映。

第一，全球化是世界性（同一性）和民族性（多样性）的统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 and 文化的相互交织和依存日益紧密和加深，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这种同一性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全球“共同利益”，增强了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意识”。这种“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以各种全球性的社会组织、全球性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的各种全球惯例作为载体来发挥作用，这些载体的产生和运作又反过来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这种同一性又表现为最具竞争力的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对世界事务的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性，它们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强大的传播手段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发展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以实现其“西化”世界的目的。

然而，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日趋扩大的利益差别又促使

人们寻找和采用更加多种多样的办法来适应和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创新，形成了各种各不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世界不可能由完全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组成，在承认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日益“趋同”的同时，还要承认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没有也不可能消失。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经过全球化的“洗礼”，成了具有丰富世界性内涵的民族性。那种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将丧失自己民族特色的观点是不符合当前世界的客观现实的。

第二，全球化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所谓全球化的客观性，就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不断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过程：随着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人们之间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也逐步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客观的历史进程。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赞成还是反对，都会或早或迟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所谓全球化的主观性，是指国际社会中的特定团体，如国家、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为了追求其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全球化的人为推进过程。从主观性来讲，当然又可以分为基本反映了全球化客观进程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主观性和背离人类进步要求的主观性。前者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等；后者如“人权高于主权”、“人道

主义干预”等反映了少数西方大国私利的霸权主义。

第三，全球化是进步性和破坏性的统一。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及其公认的国际运行机制和国际惯例，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同时，它使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产生了使整个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价值观，为人类解决全球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的大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最不发达国家可能消除贫困、摆脱落后创造了条件。总之，它使各国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上，有利于形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但是，全球化毕竟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它在促进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全球化”了。主要表现在：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同时又加剧了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在不可能有“世界政府”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情况下，增加了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还有，全球化可能使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最不发达国家日趋“边缘化”。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成熟的制度和对它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将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这是全球化的一个严酷现实。另外，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也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产生矛盾，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受到冲击，国家主权受到侵蚀。最后，全球化也为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控制发展中国家、“西化”社会主义国

家提供了条件。

全球化的上述特点，对国家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球化的世界性、客观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和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局限性和历史性；全球化的民族性、主观性和破坏性又决定了全球化趋势下国家及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绝对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会因全球化的发展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国际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没有一点冲击和影响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本身是历史性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削弱乃至消亡的过程。但是，国家的最后消亡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斗争、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全球化趋势下，一个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的事实是：从全球角度看，全球资源是以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为主体来分享其产权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拥有对自己资源的全部产权，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平调”。并且，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损失的分担是不平等的。强国受益最多，发展中国家受益相对较少或根本没有受益。由于国际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实力的不对称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的不公正，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势力和优势，以及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总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面对全球化的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国家和国家主权的武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就无法得到维护和实现。

世界上既然存在着特定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相应的

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维护和创造本国大多数居民共同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利益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概念。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是不太使用的。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时，往往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来代替。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才在我国理论界引起了重视。这是一个进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国家利益的内涵、层次、实现途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中国当前国家利益的体现及其特征等等，都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那么，研究国家利益，与爱国主义有什么内在联系呢？爱国主义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又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爱国主义不仅没有被忽视，反而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的重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理论。我们认为，爱国主义的实质，就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这是一切爱国主义者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制约和影响一切爱国者全部行为的根本因素。因为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和虚幻的说教，也不能光停留在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和对祖国历史人民的赞美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指导我们每个人言论和行动的科学理

论，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的政治原则。这就需要对爱国主义的研究理论化、具体化。而国家利益正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载体，深化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的研究，也就提升了爱国主义研究的水准。

明确了国家利益之所在，也就使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基础。从历史上看，爱国主义是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表现方式的。就层次来说，从心理学意义上的爱国情感、到伦理学意义上的爱国情操、最后到政治学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政治原则，反映了爱国主义发展的不同水准。作为政治学意义上即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的爱国主义，是同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因而是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从爱国主义的内涵来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在中国，就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和抵抗外族入侵的古代爱国主义；有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爱国主义；当代爱国主义，则是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特定的国家利益，才使爱国主义具有了不同的内涵。从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来说，更是丰富多彩的。光从我国历史上看，就有血战沙场的、为民请命的、变法革新的、建设祖国和发展经济的、科技创新和发明的，等等。每一种爱国主义的特定形式，又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根本的国家利益相关。本书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为爱国主义做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并赋予了它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为促进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明确的目标和丰厚的理论素材。

本书由朱炳元拟定撰写提纲，几经讨论后分工撰写。